



ICSL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2, No. 1, 2026, pp.30-44.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60104cstcc>



古今中西坐标上的文化自觉

——论乐黛云的现代知识分子研究及学科贡献

李 欢 (Li Huan), 马 遥 (Ma Yao)

摘要：作为中国当代历史的见证者，乐黛云先生的思想发展与蜕变始终与时代浪潮处于同构关系中。80年代初，她在西方文化的镜像下重建了鲁迅与尼采的思想联系，呈现了鲁迅“任个人，排众数”主体精神的丰富面向。与此同时，她以比较文学的视野为现代文学研究开拓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等诸多研究范式。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方法热”浪潮中，乐黛云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全新阐释，还根据中国文学实践积极进行理论探索，使西方文艺理论成功转化为比较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80年代末90年代初，乐黛云则站在世界文化对话的大背景下对学衡派进行重新解读，从而有力回击了“国学热”中“封闭、孤立、倒退的文化孤立主义”。进入21世纪，乐黛云以古今中西的文化坐标再次重读鲁迅的著作，呈现了鲁迅“任个人，排众数”主体精神更为深广的文化自觉意识。可见，在每一次时代浪潮的激变中，乐黛云始终以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敏锐地把握住历史发展脉搏，不断重返现代文学历史现场，引领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乐黛云；文化自觉；主体精神；现代文学；比较文学

作者简介：李欢，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现代文学，电邮：lhwenxueyuan@gdou.edu.cn。马遥（通讯作者），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电邮：mayaomarxism@163.com。

Title: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cross Temporal and Cultural Coordinates: On Yue Daiyun's Research on Modern Intellectuals and Her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Abstract: As a witness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Yue Daiyun'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have consistently been in a structural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currents of her time. In the early 1980s, she reconstructed the intellectual connection between Lu Xun and Nietzsche through the lens of Western culture, revealing the rich facets of Lu Xun's subjectivity, characterized by "asserting the individual while disregarding the multitude."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he pioneered numerous research paradigms in modern literary studies, including influence studies, parallel studies, and interpretive studies. Amid the methodological fervor of the mid-to-late 1980s, Yue Daiyun employe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to reinterpret Chinese literature, while actively explor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based on Chinese literary practices, successfully transforming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to a resource for comparative and modern literary research.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she reinterpreted the Xueheng School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global cultural dialogue, effectively countering the "cultural isolationism" that marked the nationalist scholarship boom.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Yue Daiyun revisited Lu Xun's works through the temporal and cultural coordinates of both past and present, East and West, revealing a deep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cultural self-awareness inherent in Lu Xun's subjectivity of "asserting the individual while disregarding the multitude." Evidently, throughout the upheavals of each era, Yue Daiyun, with the intellectual's sense of subjectivity, has perceptively grasped the pul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repeatedly returning to the historical scene of modern literature and guiding the trajectory of modern literary studies.

Keywords: Yue Daiyun; Cultural Self-Awareness; Subjectivity; Moder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uthor Biographies: **Li Hu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News Communication,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lhwenxueyuan@gdou.edu.cn. **Ma Yao**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Marxist Philosophy. E-mail: mayaomarxism@163.com.

乐黛云先生的一生与中国时代的风云变化紧密相连，其学术思想随着每一次时代巨变不断演进与发展。大学毕业时，乐黛云选择了充满活力的现代文学作为研究方向，并在紧张的政治氛围中对现代文学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化，乐黛云逐渐走上了比较文学之路，更以开阔的国际视野、丰硕的学术成果以及卓越的组织能力，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与开拓者。然而，乐黛云的学术贡献绝不仅仅止于比较文学学科。她以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主体意识，凭借古今中西深厚的文化积累，跨越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深刻影响了比较文学与现代文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学术思维的转型。然而，乐黛云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

第二代学人，其对现代文学学科的贡献尚未得到较为全面的梳理。因此，本文将循着乐黛云思想发展脉络，探讨她如何以古今中西的文化坐标切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并在比较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交汇点，呈现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贡献。

一、西方文化镜像下的知识分子主体精神

1981年，乐黛云发表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旋即引起了学界的轰动。众所周知，鲁迅早期曾受到尼采思想的影响，但在当时学界，如何阐述二者的关系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毕竟，尼采一向被视为“帝国主义走狗”“极端个人主义分子”（乐黛云，2021, p.57），如何能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进步作家和这种恶人联系在一起？然而乐黛云始终坚持从事实出发，重新梳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空间。学界每论及乐黛云此文，不仅折服于乐黛云敏锐的研究触觉、深刻的思想洞见，更敬佩其敢于冲破思想桎梏、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与胆识。其实，该文不仅是乐黛云长期学术积累的成果，更折射出其“任个人而排众数”的鲁迅之魂。

乐黛云（2021, p.43）曾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我最崇拜和喜爱的就是鲁迅。我始终认为他是20世纪最了解中国的人。”因此，鲁迅思想不仅是乐黛云始终关注的研究对象，更是其思考人生、社会，乃至世界的出发点。在政治风云变幻的50年代，乐黛云总是一有时间就投入到鲁迅研究当中。她对鲁迅早期思想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试图突破“当时盛行的思想内容加人物性格，不切实际地追索思想意义、教育意义、认识意义的研究模式。”（乐黛云，2021, p.29）1958年，她将自己的思考写成长文《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在该文中，乐黛云详细阐释了“掇物质，张灵明，任个人，排众数”的具体内容。她（2015, pp.105-108）特别指出，鲁迅要排的“众数”，非“不堪命矣”之民，而是“千万无赖之尤”；鲁迅所谓“任个人”，虽希冀“先觉”能“不阿世媚俗而有自己的见解”，但其根本目的在于“逐渐唤起国人，促使为‘志士’所不屑道的‘古国胜民’的觉醒”。据此，乐黛云提出，鲁迅虽然借用了尼采等人“张灵明，任个人”的口号，但其内容与目的与尼采的“超人”说截然不同：尼采的超人是“压制和摧残人民的反动强力的化身”，而鲁迅的“先觉”者是“和人民站在同等地位的”，“促使人民‘入于自觉之境’”。不难发现，乐黛云明了鲁迅的“任个人”具有知识分子主体自觉与觉民的双重面向，但此时的她更关注鲁迅觉民之一面，因之也更为强调尼采与鲁迅之间的区别。这种对鲁迅“任个人”思想的重新阐发，正映射出乐黛云对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追寻。即使在黑白颠倒、人性异化的年代，自身被“罗网困陷”之时，鲁迅“任个人”的主体精神也从未离开过乐黛云的研究视野，反而唤起其更自觉的生命意识，将其内化为更深层的生命思考。这种由生命独特体验凝结而成的思考集中反映在《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一文。

《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发表于1980年，但其实该文成于1963年。1958年，乐黛云被下放到门头沟山区监督劳动。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她常常想起《伤逝》。在她（2011, p.47）看来，鲁迅的短篇小说很多都反映了“鲁迅早期思考的问题，特别是那些独特的‘精神界之战士’的遭遇”。于是，在劳改结束，返回北京大学后，她迅速写下了这篇文章。比起侧重论述鲁迅“觉民”一面的《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论《伤逝》展现了鲁迅笔下知识分子群体更为丰富的精神面向。她（2015, pp.121-122）反驳了将《伤逝》的主题归结为“对资产阶级爱情至上主义的批判”的观点，

并指出那曾使子君和涓生“希望、欢欣、爱、生活”的信念和理想的逝去才是产生悲剧的真实原因。在此基础上，乐黛云（2015, p.123）进一步追问了其信念和理想逝去的根本原因，并由此揭示出《伤逝》的主题：“‘无物之阵’，这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黑暗制度扼杀了一切美好的希望”，“它使子君不得不平庸，使涓生不得不冷酷，使生活扭曲变形，全无出路。”然而知识分子因为无路可走就止步不前吗？乐黛云（2015, p.125）认为“涓生在苦痛和渺茫中仍然坚持‘向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正从侧面反映了鲁迅“始终坚信新的生路是存在的，只要寻找就能找到。”其实，涓生和子君的痛苦、茫然何尝不是乐黛云于“罗网困陷”时的写照？在劳改时，乐黛云（2011, p.50）常常想起《伤逝》中“靠‘一点小米维系残生’的‘鸟贩子手里的禽鸟’，想起‘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的坏孩子手中的蜻蜓，想起那无所不在，而又看不见、摸不着，冠冕堂皇，无法反抗的‘无物之阵’。”可见，“罗网困陷”的生命体验不仅没有使乐黛云与时代意识同质化，反而激起其“任个人”的自觉生命意识，使其能够深潜于鲁迅的短篇小说，解读出《伤逝》主题的深刻内涵，并外化为更自觉的行动。如同鲁迅笔下孤独的知识分子，乐黛云在苦痛和渺茫中也从未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向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因此，她从未停止过对学问的追求，于困顿中写下了这篇论《伤逝》，“并十分傻气地将它寄给《人民日报》”。当然，乐黛云（2011, p.51）对发表此文并不抱有希望，“只是希望有人得知鲁迅的深刻性，有人会在生活中引起一些什么联想。”这种“任个人”的自觉生命意识使乐黛云对学问始终抱有开放的态度，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冲破种种限制，在中西比较的广阔视野下将现代文学研究推向新高度。《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便是乐黛云在西方镜像下重新观照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名文。

比起《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对知识分子“觉民”思想的强调，论《伤逝》对知识分子“罗网困陷”悲剧的分析，《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重新结构了鲁迅笔下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使其得到较为全面而立体的呈现。首先，乐黛云（1980a, pp.20-33）冲破了思想禁区，指出“一些思想家、艺术家的客观成就往往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被一笔勾销；他们所曾产生的客观影响也被一概抹煞，甚至把好影响说成是坏影响，或者把这种影响归结为受影响者个人思想的弱点和错误，而不去分析产生这种影响的社会原因”，“这就妨碍我们全面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对客观存在过的历史现象做出正确评价。”因此，乐黛云在该文对尼采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做了全面而缜密的分析论证。以尼采为镜，乐黛云将鲁迅的思想分为“五四”以前、“五四”运动前后、“三十年代以后”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对于鲁迅五四以前思想的分析，异于前文对尼采与鲁迅思想区别的强调，乐黛云此时明确表明了二者的联系。也许是出于《伤逝》中个体“罗网困陷”的深切体悟，乐黛云对鲁迅思想的解读有了更明确的个性觉醒的指向，这点突出体现在其对“排众数”和“任个人”思想的阐释上。在《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一文中，乐黛云强调鲁迅要排的“众数”是“千万无赖之尤”，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中，她在尼采的镜像下，以知识分子的主体视角，丰富了鲁迅所批判的“众数”之面向。她指出：“千万无赖之尤”的“众数”，“‘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无视个人的独创和个性，这样‘夷隆实陷’（削高填平）的结果必然是‘伧俗横行’，‘全体以沦于凡庸’。”基于此，她进一步指出：鲁迅扫除19世纪文明“物质”和“众数”通弊的希望仍在于尼采所谓“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而“‘任个人’就是反对无视个人特点，提倡发扬个性和个人的独创精神。”由是，她重建了尼采与鲁迅的联系：“鲁迅‘掇物质张灵明，任个人排众数’的思想显然正是以尼采思想为其根据，同时又是以尼采思想为其归宿的。”然而，正

如洪子诚（2008, p.109）教授所言，乐黛云是位有“生命热度”的学者，“她爱的还是那个‘启蒙者’鲁迅，那个将‘个性主义’作为生命内核，而将‘人道主义’作为历史责任的鲁迅。”因此，乐黛云在该文仍然强调“鲁迅虽然接过尼采的口号，运用尼采的某些思想形式，但目的与内容都与尼采不同。”在尼采的镜像下，乐黛云展现了鲁迅笔下更为丰富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乐黛云从此也以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体意识在学界重新启航。

二、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1958年，乐黛云被迫退出学术舞台，放逐于学术圈之外。然而乐黛云从不怨天尤人，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她（2015, p.270）说：“二十年‘执心自食，欲知本味’；二十年深入底层，欲知我的根源和民族，我决不认为这是浪费，也从不怨尤。”二十年过去了，乐黛云终于恢复了教学身份。过去所有的磨难孕育了无与伦比的“绝色霜枫”，血与火的生活所凝结而成的学术思考在新时期喷薄而出。此时乐黛云接到了为留学生讲授现代文学的教学任务。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当时现代文学课程仍被限定在僵死的框架下，给留学生讲课有可能“会被扣上‘里通外国’之类的罪名”。（乐黛云，2011, p.51）然而乐黛云再次以知识分子自觉的生命意识冲破思想桎梏，突破现代文学教学的僵死模式，给学生讲了徐志摩、艾青、李金发等“资产阶级”作家。为了让学生较深入理解他们的作品，乐黛云“（2011, p.51）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中国传播的情形。”由是，她对学界长期被遮蔽的问题，即“西方文学在中国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了长文《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1980年）与《漫谈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北大“五四”文学社的讲演提纲》（1981年），后以《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为题收录于《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钱理群（2021, p.38）曾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中有三篇文章，对80年代‘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起到了指导和引领作用的”，其中一篇就是乐黛云的《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而另一篇《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则是前文的深化研究。在这两篇文章中，乐黛云以比较文学的立体视野探讨了重写文学史、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国外的现代文学研究等诸多极具先锋性的问题。她的学术观点和看法成为后来学者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起点，并由此延伸出众多可深耕细挖、后劲十足的命题，大大扩充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版图。

乐黛云在（1980b, p.289）《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一文中首先指出：“如果中华民族不曾突破长期以来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也就不可能产生。从历史实际来看，世界思潮，特别是文艺思潮的确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这种痕迹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有别于古典文学的重要标志之一。”不难看出，乐黛云已经以其敏锐的思想触觉领悟到重建现代文学学科的着力点，即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重写文学史的新路径。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被严格限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的框架下，以五四文学革命为新旧划分的界限，并由此规定了新文学“必然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王瑶，1954, p.8）然而乐黛云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提供了“世界文学”的参照系，从而将其置于中西的文化坐标上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她（1980b, p.291）谈到：“无论是对于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或是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影响，我们都还研究得很不够，而缺

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就很难写得全面而深入。”她（2015, p.61）在另一篇文章《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则表达出对突破“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的关注：“我们现在一般界定的现代文学只有三十年历史（这个界定有待于讨论）。”虽然重写文学史并不是该文论述重点，但“有待于讨论”一语无疑透露出乐黛云对此问题的先锋意识。钱理群（2021, p.39）曾谈起，当初他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和设想告诉乐黛云时，“她立即表示很有兴趣”，并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会议上，将这一概念作为“学术新动向”告诉了王瑶先生。可见，乐黛云虽然在后期转向了比较文学，但置身于世界浪潮中的现代文学本就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乐黛云始终关注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和走向，并极力推动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下，乐黛云还开辟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诸多路径，如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回到现代文学的历史现场，她（1980, p.289）郑重提出：“研究世界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应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乐黛云（2015, p. 62）还特别说明：“我们这里所讲的影响绝不是一方施加影响，一方接受影响的消极过程。事实上，一切外来思潮或文艺进入中国社会，都曾按照中国社会的需要受到筛选和改造。”这就启示研究者应从接受者的主体意识出发，追踪外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乐黛云（1979, p.62）在《茅盾早期思想研究（一九一七——一九二六年）》一文中特地回击了中西部分学者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西方文化“反响”“表现”或“移植”的观点，强调五四新文化“毕竟是自己‘民族的文艺’，这是任何‘移植’、‘反响’所不能代替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乐黛云还关注到中外文学影响研究的双向性。她（1980b, p.290）认为：“外国文学影响了中国，中国文学也必然对外国产生影响。”以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为镜像，乐黛云分析了鲁迅小说《伤逝》以及茅盾小说《创造》中的娜拉式人物，并据此延伸出一个重要命题：“娜拉形象在中国的这些发展，肯定给国外研究易卜生的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当然，关于中外文学双向互动研究领域的开拓，尤其是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乐黛云并不止于提出问题，更是以详实的史料论证出可靠的结论，为后来学者提供了众多鲜活的个案分析，如《茅盾早期思想研究（一九一七——一九二六年）》、《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和艺术创新——为悼念茅盾同志逝世而作》以及上文提到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等。

平行研究是乐黛云突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局限的另一路径。与影响研究相比，平行研究关注“并无直接关系的两国文学在文学发展趋势、文体、风格、主题、题材等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乐黛云，2015, p.39）乐黛云（1980b, pp.291-292）认为“必须了解同时期世界文学发展的状况，才能更深刻地看到我们自己文学的民族特色。”她特别谈到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所采用的平行研究法，“那就是把二十年代初期在中国产生的现代文学与同时代的世界文学相比”，最后得出一些发人深思的结论，如“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多半描写个人精神上的空虚，不是失望，便是厌倦；而中国现代小说虽也暴露黑暗和腐败，但他们对祖国仍存一线希望，相信某种制度可以挽救垂危的中国。”以世界文学为镜，乐黛云（2015, p.63）再次看到另一种研究路径——平行研究的巨大潜力，并汲汲告诉学人：“与同时期世界文学的比较中来看中国现代小说的特点，当然要比孤立地‘就事论事’来得深刻。”为了推动比较文学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乐黛云在论述中提出了一些平行研究的论题，如比较欧洲文艺复兴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异同。这些论题成为后来学者继续开拓现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读乐黛云的文章，常常会“层峦叠翠，深不见底”之感。借镜西方，重审

现代文学，本已是极具创新性的做法。但乐黛云（2015, p.63）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也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更有效地向国外介绍我们自己的成就。”在乐黛云宏大的研究视野中，世界与中国从来不是单向、静止的观照，而是一个循环流动的过程。这就昭示现代学人在新时期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以西方为镜重审现代文学，再以此为基石，让现代文学走向世界。

为了突破现代文学研究瓶颈，乐黛云在 80 年代初还介绍了“阐发研究”的范式。值得一提的是，乐黛云此时还没有正式提出“阐发研究”这一概念，但她所论述的内容已经进入“阐发研究”的领域。那时，近三十年的封闭使中国失去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面对重新打开的世界场域，乐黛云兴奋之余，更觉赶上世界文学思潮之紧迫。“近几十年来，文艺理论、文学批评、作家作品分析等方面在国外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如果我们仍停留在原处，就不能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满足人民需要。”（1980b, p.292）此时乐黛云再次充当了学界引路人的角色，简要介绍了美国新批评派、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心理学的批评方法、象征的文艺批评法等。面对信息滞后的学界，乐黛云在《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与《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两篇文章中均借鲁迅的话号召学界“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它剩落在过去里。”（乐黛云，1980b, p.296）她认为“各种流派的批评方法都可以启发思考，对我们有所助益。”然而当时还处于政治解冻初期，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激进思潮的影响。为了消除学人的疑虑，实现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突围，她（1980b, p.297）坚称：“只要有正确的态度，更多地了解国外各派文学批评方法，并不会将我们引起歧途而只会使我们更加丰富。”而为了更好呈现“阐发研究”具体的实现路径，乐黛云提供了一些可资参考的论题，如使用象征的文艺批评法分析老舍作品中的“月牙儿”等。钱理群教授（2021, p.38）曾说，乐黛云“对‘当代世界文艺批评方法和流派的借鉴’，这也是 80 年代中期包括现代文学在内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界‘方法热’的一个先声。”由此可见，在阐发研究方法论的开拓上，乐黛云又一次以先锋者的姿态引领了一代风潮。

乐黛云在 80 年初除了引进国外的研究范式外，还编译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首次向国内学界引进了外国鲁迅研究的论著，为学人提供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诸多范例，极大地开阔了学人的研究视野，深深影响了后来的鲁迅研究。如陈平原（2021, p.125）曾说起该译著“对其时中国学者的冲击，我记忆犹新。其中收录张隆溪译《鲁迅小说的技巧》，更是让中国学者大开眼界。”又如洪子诚（2008, p.107）谈到：“当时这本论集，对我有一种打开‘新的天地’的冲击”，“冲击主要来自‘英语国家’的那些观点和论述角度。”他由此产生对固有鲁迅研究传统的疑问：“对一个多少已被神化的人物的谈论，可否以‘唯心主义’的语言方式，来触及其隐匿、且复杂难明的生命世界，他的心灵秘密，他个人的孤单感。”洪子诚（2008, p.108）认为，该译著中“夏济安他们的这些谈论，影响（确切地说，应该是预告）了 80 年代中国大陆‘存在主义鲁迅’的逐渐浮现。”

80 年代初，乐黛云以知识分子主体的生命意识，跟随五四先辈们的文化路径，自觉汇入世界文学的大潮中。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她重返五四历史现场，开辟了诸多研究范式，使之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此外，她紧密追踪国际文坛的研究动向，编译了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使现代学人的耳目为之一新。此时乐黛云已经生发出强烈的方法论意识，而进一步的理论运用与材料深挖则在等待另一个人生转折点——大洋彼岸的进修访学。

三、走向世界的“文化热”

1981年，乐黛云赴哈佛大学访学，专修比较文学课程。1982至1984年间，她又受邀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客座研究员。在这三年里，乐黛云撰写了回忆录 *To the Storm* 《面向风暴》和学术著作 *Intellectuals in Chinese Fiction* 《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其实，这两本专著可以说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面向风暴》是对作为知识分子的“我”的剖析，《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则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关于《面向风暴》，乐黛云（2011, p.67）说“我确实毫无讳饰地真诚袒露了我的心。”然而，乐黛云的自传叙述从不走向自我情感的沉溺，其中仍然贯穿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她（2011, p.66）说：“我写那本书的时候，只是想留下一页真实，让后来的人们知道，曾经有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人们竟是这样生活、这样思考、这样感觉的！”可见，乐黛云重返个体的历史叙述早已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以更高的知识分子责任感反思自我、剖析自我。此时乐黛云“任个人”的主体思想也呈现出更为深刻和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指向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更指向知识分子自我反思、自我超越。如此便不难理解乐黛云何以会以不同时期的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并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郑重提出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如连·本达强调“知识分子理想的绝对性，禁止他和政治家难于避免的‘半真理’妥协”；卡尔·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就应保留一点创造性不满的火星，一点批判精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某种张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提出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之间的距离，也正是保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某种张力。”（乐黛云，2011, p.71）这“一点创造性不满的火星”，“一点批判精神”使乐黛云总是勇于直面现实的不足，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在学术道路上不断超越自我。

回国后，乐黛云便以不与“半真理妥协”的姿态投入到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中。此时中国正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浪潮。这股“文化热”浪潮一方面大量引入外国的新理论、新方法；另一方面则痛感文化的断裂，从而激发起文化的寻根。但乐黛云“对当时盛行于文艺界的‘寻根思潮’也有不同的看法”。她（2011, p.99）认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世代相传的土地上，好的、坏的、优秀卓越的、肮脏污秽的，都从那传统的根上生长出来。我们既未曾失落它，也无法摆脱它，还到何处去寻呢？”在乐黛云（2011, p.117）看来，“‘文化热’的核心和实质就是酝酿新的观念”，“要促成我国悠久文化的发展新阶段，首先要有不同于过去的新观念。”三年的美国研学使乐黛云对理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她将其多年潜心研究的理论成果都凝聚于1987年和1988年连续出版的学术专著《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原理》。这两本专著不仅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绕不开的高峰。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体现了乐黛云的思想发展历程。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谈的是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认识；第二部分主要在世界文化的视野下重新探讨西方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第三部分则运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重新解读中国文学，亦即“阐发研究”。前两部分内容大多已见于期刊杂志，第三部分内容则是乐黛云回国后所写，集中体现了乐黛云于美国三年的理论积累及创新性阐发。在该部分，乐黛云详细介绍了西方的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叙述学、诠释学。比起之前的《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一文，此时的乐黛云对理论有了更深入和系统的把握。如对于新批评派的阐述，乐黛云不再止于对理论的简要介绍，而是深入辨析了“构架”、“肌质”、“语象”等概念。又如对结构主义的介绍，乐黛云分别探讨了诺斯罗普·弗莱、罗伯特·史柯尔斯、托多洛夫等人的理论。值得一提的是，

“阐发研究”范式的引入在当时学界引起了不少争论。有人批评这种研究范式是将西方理论强加于中国文学，会造成削足适履；有人带着民族主义情绪认为中国文明历史悠久，“借用他们的观念有什么必要？”等等。面对这些质疑，乐黛云（2011, pp.83-84）认为“问题在于拿出实例，说明这种阐发确实对推动中国文学发展有益。”因此，在这些文章中，乐黛云将这些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文学的具体分析中。如在《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新批评派与小说分析》中，乐黛云运用茅盾《幻灭》中“起重机”、“烟囱”的比喻以及鲁迅小说《药》中“红白相间的花环”象征来说明“语象”的三个层次。此外，她（2011, p.228）还运用新批评派的“细读法”挖掘了《红楼梦》暗喻和象征的宝库，并指出“我国的小说评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本文细读’。”乐黛云以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西方理论经过接受者的创造性阐释，完全可以运用到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回应了当时学界对阐发研究的质疑，从而成功为比较文学与现代文学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正如王瑶先生（2015, p.12）在该书序言所说：“这类知识在中国还是比较陌生的，因此她的这方面的文章都带有一定的开创和介绍的性质。但它对我们不仅有开拓视野、可资借鉴的作用，而且对现代文学本身的研究也是十分有益的。”还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乐黛云研究的视域已延伸至传统文化。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她对现代文学“古今中西”之争的重评。

比起《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对理论阐发的侧重，《比较文学原理》一书则体现了乐黛云在理论建构方面的探索，如对影响研究的深化拓展。20世纪70年代，接受美学被引入影响研究，刷新了传统影响研究的范式。而置身于世界思潮中的乐黛云也从中国文学实践出发，积极参与了影响研究的理论建构。她（1989a, pp.54-55）指出，过去的影响研究是一种“外缘研究”，“只研究作家与作家之间或作家与思想家之间的交往”，追寻播送者影响接受者的实证关系，却很少研究播送者如何被接受，其中又发生了什么变异等文学性内部问题。但接受理论的引入使“这一单向过程改变成为双向过程，就为这一领域开辟了许多新的层面。”乐黛云（1989a, p.54）认为：接受理论“强调作品本身文学性的形成就包含作品所处的‘历时性’的和‘共时性’的相互制约的背景，文学性实际上不可能脱离这个互相关系之网而独立，文学作品总是纵的‘垂直接受’与横的‘水平接受’所构成的座标上的一点。”乐黛云（1989a, p.61）进一步指出：“接受理论为比较文学研究者提供了编写完全不同于过去体制的新型文学史的可能”，我们不仅可以建构由“创造”、“传统继承”以及“引进”为支柱的新型文学史，还可以“从读者角度出发，研究读者心态的历史。”由此，她（1989a, pp.61-62）提出“如果整理‘五四’以来，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外国作家被中国读者所选择和接受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被强调的不同方面，就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近八十年中国社会心理的发展和变迁。”乐黛云还以专章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对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接受，为重写文学史做了初步的清理梳理工作。

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方法热”浪潮中，乐黛云以“一点创造性不满的火星”和“一点批判精神”进入世界文学语境，不仅用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全新阐释，还根据中国文学实践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并将其建构的理论范式运用于文学批评。在乐黛云的论述中，理论探索与文本分析形成了一个相互观照的开放场域。通过这种相互观照，西方文艺理论实现了创新性转化，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打开比较文学研究与激活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并且在乐黛云看来，这种成功转化的理论资源也从不是封闭的体系，它需要面向世界不断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架。她（1989a, pp.191-193）曾多次谈到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的“耗散结构”和“熵”的观念对社会人文学科的渗透。在一个封闭

的体系中，“熵的增大打破了一切秩序，也就是淹没了一切事物的区别和特点而使一切趋于单调、统一和混沌。”“要防止熵量的增加，就必须突破隔离封闭的体系，不断增加信息量，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不断改变主体的结构以适应新的情况。”同理，当“社会的运作趋向于统一化”，艺术家“带来一定的信息，信息就是负熵，信息打破旧的统一和沉寂，减低了混沌的程度也就是减低了熵量。”因此，乐黛云始终以“反熵”的历史使命感让“方法热”面向世界，在理论“立”与“破”的持续张力中推动学科的发展。¹

四、世界文化对话中的现代文学研究

1989年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后新时期”。在乐黛云（2011, pp.118-119）看来，“这是全然不同于十年新时期的另一种时期”。“国学热”悄然取代了80年代的“文化热”。倘若说“文化热”热衷于引进新方法和新观念，以世界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文化；那么“国学热”则强调“从本土文化本身酝酿出新的观点和方法。他们信奉‘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相信只有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纯而又纯的本土文化才能称雄于世界，以至取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位置。”与此同时，西方的后殖民主义思想开始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后殖民主义认为西方以其文化霸权阐释东方，致使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处于失语状态。因此，对于殖民地或者第三世界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颠覆西方文化霸权，发扬本土文化。这种后殖民主义思想更进一步强化了“国学热”。在学界风潮由“文化热”转向“国学热”的过程中，为探寻中国文化的出路，乐黛云回溯了五四时期的古今中西之争，对学衡派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她连续写了《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1989）²、《文化更新的探索者——陈寅恪》（1991）、《“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汤用彤与〈学衡〉杂志》（1993）三篇文章。

数十年来，学衡派因与新文化运动相颀颀的文化姿态，被扣上了“复古”、“反动”的帽子，其思想主张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乐黛云（1980, p.290）在80年代初也曾接受文学史的观点，认为“学衡派的胡先骕、吴宓则力图介绍西方‘最新’的，但并不健康的思潮。”然而乐黛云（2021, pp.181-186）“对此多少有些怀疑，深感证据不足。”当乐黛云在哈佛大学接触到吴宓、梅光迪、汤用彤与“新人文主义”的关系后，“更是觉得《学衡》的问题必须重新探讨。”于是，她对《学衡》的史料进行了全面的阅读，并由此发生了“学术思想的一大转折”。在《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一文中，乐黛云（1989b）将学衡派置于世界文化对话的大背景下进行了重新探讨。此文对于学衡派研究乃至现代文学研究都具有重大的价值与意义：

¹ 赵柔柔也谈到：“乐黛云对‘反熵’这一概念的偏好，折射出了她推动建立比较文学学科不断反思的初衷”。参阅赵柔柔：《乐黛云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中国主体身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5卷第1期。

² 20世纪80中后期，“文化热”中掀起了一股反思五四的浪潮，并于1989年达到顶峰。许纪霖说，这些声音成为90年代“国学热”的原初生长点。（参阅许纪霖，《民间与庙堂——当代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版，第184页）乐黛云撰写了《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回应当时反思五四的思潮，重现了五四“多元共生”的文化空间，并由此展开对未来中国的文化构想。乐黛云撰写该文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动因可参阅拙文《乐黛云重估〈学衡〉的历史语境与学术史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首先，乐黛云以“世界文化对话”的视角重新审视学衡派、自由派与激进派的论辩，将学衡派视为“与世界文化思潮紧相交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高度肯定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启蒙的重要贡献”。此举突破了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藩篱，不仅开启了学衡派研究的热潮，而且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不少学者沿着乐黛云所开辟的路径，重新挖掘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其次，在世界文化对话的视角下，乐黛云不仅肯定了学衡派，更挖掘出学衡派文化探索之于世界的意义，从而顺利将他们重新织回了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乐黛云（2021, pp.183-184）后来回忆重估学衡之举时曾谈到：“五四以来，中国的改革已经汇入世界运动的洪流。世界争论的大潮包括白璧德与杜威的争论，科学主义与泛情主义引起的广泛怀疑，以及斯宾格勒有关‘西方的没落’的预言，都不能不在中国激起强烈的反响，促使一大批中国人参加这一世界性对话的行列。”可以说，“世界文化对话”的视角极大地丰富了原来的“接受与影响”研究模式。它将对话双方置于“影响”主体与“接受”主体身份流动的历史场域中，从而使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双向交流的动态图景得到初步呈现。

对于“国学热”中引起广泛关注的另外两位学衡派成员陈寅恪和汤用彤，乐黛云延续了“世界文化对话”的思路。她（1991a, p.80）在论陈寅恪一文开篇即提出：“论者多以寅恪先生为中国文化之承传者、固守者、史料集成者。这固然不错，然而仅仅以此涵盖先生之学术襟怀，伟大一生，则不但远远不够，甚且未得先生之真精神。”在乐黛云看来，陈寅恪的真精神是“借助于外来‘野蛮精悍’的新鲜血液”改造旧躯体，“重启新机”，“他毕生所追求的是在世界思潮激荡之中的中国文化更新之途”。在讨论汤用彤时，乐黛云（1993, p. 62）则强调“关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探索和实践贯穿于汤用彤毕生的学术生涯。”因此，对于“国学热”中抬头的“封闭、孤立、倒退的文化孤立主义”，乐黛云（2011, p.119）坚持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拒斥外来文化的封闭状态。”随着对学衡派的研究，乐黛云的研究兴趣也逐渐转向了传统文化。

五、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化自觉

在 21 世纪到来的前夕，乐黛云（1991b, pp. 31-32）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时期”：一方面，“发达世界文化自我中心的解体和寻求他种文化作为参考系的需要”；另一方面，“第三世界面临对本土文化赋予新义的历史使命并从世界文化边缘向世界文化中心位移。”世界将进入“文化多元共存”的新时代。然而这一文化转型时期仍内藏多重危机：一方面是文化霸权主义对其他文化的压制，削弱了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文化孤立主义可能引起的文化对抗，同时又导向自身文化的衰微乃至毁灭；另外，自然科学“也向未来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乐黛云，2022, p.156）。面对文化转型时期的危机与挑战，乐黛云认为（1998, p. 53）

“东方文化经过数百年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对自身文化的反思”，有能力“参与未来世界文化发展问题的思索和解决”。而比较文学要完成文化转型的历史使命，则必须“展开多方面异质文化中文学交往的研究。”在异质文化间的文学研究中，乐黛云则认为“要进行真正的对话”，应该以“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中介。不同文化体系的人们会根据他们的思维模式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共同话语也就由此产生。“这种对话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各种文化长期形成的特色和独创，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了解他种文化，找到新的参照系，以便对自身进行新的审视，通过‘互为主观’，突破

旧体系，完成文化现代化。”（乐黛云，1990，p.17）不难发现，进入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乐黛云的“世界文化对话”有了明确的指向——直面世界文化危机的民族文化现代化。由是，她全身心投入到比较文学的文化研究上，不仅对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更沉潜到传统诗学领域，思考传统诗学之于世界文论的意义和价值。而当乐黛云以古今中西的文化坐标再次重新审视现代文学之时，撰写了《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1999）与《“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重读鲁迅在日本的四篇著作》（2004），为学界呈现了五四知识分子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所做出的贡献。

在《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中，乐黛云以“世界文化对话”的视角再次重返知识分子“任个人，排众数”主体精神的命题。她谈到，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了“白心”和“神思”两个概念。“白心”出自《庄子·天下》篇；“神思”出自《文心雕龙》。鲁迅所谓之“白心”，即“以‘不累’、‘不饰’、‘不苛’、‘不忤’的态度，直白其心”，“如奥古斯丁、托尔斯泰、卢骚等人的直白之书”。（乐黛云，1999，p.35）“神思”则指“‘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内在而真诚的丰富的想象力。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曾将尼采等人所代表的‘崇奉主观、’‘张皇意力’、尊崇独创的一派定名为‘新神思宗’。”（乐黛云，1999，p.35）“白心”和“神思”结合“就能发出出自内心的精诚之声”。这种“心声”可以“发国人之内曜”，进而使古国胜民“咸入自觉之境”。延续80年代初的观点，乐黛云特别强调鲁迅这些思想的出发点是“矫十九世纪文明之弊害”。然而，在“世界文化对话”视野下，此时的乐黛云对鲁迅“任个人，排众数”的命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她指出：“自由追求和独立创造精神”曾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性的形成，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对人的压制和“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自由创造”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鲁迅所呼唤的“心声”和“内曜”与“神思”和“白心”一方面“和现代主义的‘自我无限精神’和‘意志的胜利’血脉相连”；另一方面又与西方现代主义“无目的地提倡个人自由和放任”相异。鲁迅现代主义的底色是“启‘群之大觉’，‘建立人国’的理想和追求”。（乐黛云，1999，p.38）由此可见，通过将鲁迅思想置于古今中西的文化坐标加以考察，乐黛云不仅挖掘出“鲁迅提出的‘神思’和‘白心’给中国传统的文化话语注入了现代性的内容”，还呈现了鲁迅对“矫十九世纪文明之弊害”独特的文化思考。倘若说80年代初，乐黛云在西方文化的镜像下重建了鲁迅笔下知识分子主体精神与尼采的联系，那么在21世纪之交，乐黛云则在“世界文化对话”的视角下进一步揭示了其主体精神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鲁迅“任个人，排众数”的主体精神也随之呈现出更为深广的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是由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命题：“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¹。乐黛云（2022，p.184）认为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第二，“要自觉到旧文化”，必须“进行新的现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和发展”；第三，“要自觉到我们今天是作为全球的一员而存在”，“了解世界文化语境，参与世界文化的重组，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乐黛云（2022，p.184）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正是“针对中国百年来有关古今中外讨论的智慧的结晶”，更是“解决当前‘文化霸权主义’

¹ 转引自乐黛云：《世界大变局与文化自觉》，《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乐黛云卷》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496页。

和‘文化割据主义’尖锐对立的一剂良方。”如此便不难理解乐黛云何以会在 21 世纪之初再次重读鲁迅在日本的四篇著作，并将《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以及《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容重新统摄于“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思想命题下。她（2004, p.19）在《重读鲁迅在日本的四篇著作》中指出：“鲁迅首先是在‘审己知人’的比较中去寻求文明的发展之路的。”围绕“十九世纪文明之弊害”，乐黛云（2004, p.19）揭示了鲁迅对此问题更为深刻的思考：“西方文明发展到这个地步，亦非自觉的选择，而是‘不得已’。今天中国则可按照自身的需要来决定取舍。”通过再次解读鲁迅对进化论、尼采思想等西方文化的看法，乐黛云申明了鲁迅“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自觉。可以说，乐黛云在新世纪自觉肩起了费孝通先生“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的历史重任。乐黛云（2010, pp.24-25）认为百年来中国文学“一方面是空间性坐标，即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机械文明’和‘信息文明’两个文明重叠的挤压下，与世界的情愿和不情愿的交往；另一方面是时间性的坐标，也就是格非所说的那个更隐秘的、向传统回归的过程。”然而，“遗憾的是 100 年来，我们沿着这条主线进行的研究和总结还非常不够，能将古今中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来阐发的著作还不多。”因此，乐黛云在新世纪主编了《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为在古今中西文化坐标上重新阐发现代文学做了初步的尝试。

乐黛云（2015, p.271）曾说：“我寄希望于年轻一代”，“他们可以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学者，他们可以成为中外兼通、博采古今的文化巨人”，“在他们登上那宏伟壮丽的历史舞台之前，也许还需要一些人鸣锣开道，打扫场地？我愿作那很快就会被抛在后面的启程时的小桥或小径，我愿作那很快就会被遗忘的鸣锣者和打扫人。”每每读到此处，总不禁为乐黛云的无私与谦逊所感动。然而，乐黛云又何止是“鸣锣者和打扫人”。她毕生所致力搭建的横贯古今、融通中西的文化之桥，为中国文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学术天地。这座桥承载着中外文化的深层对话与相互启发，也在更广阔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不断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广东海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东方杂志》（1911-1933）与中国‘世界主义’文学的生成”（项目编号：C22807）；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项目编号：GD24XZW07）“老庄之‘道’的跨文明诠释研究：基于语言学理论”。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Li Hu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3-5290-6429>

Ma Yao ^{ID} <https://orcid.org/0009-0003-1453-0539>

References

乐黛云（1979）：“茅盾早期思想研究（一九一七——一九二六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01）：134—158。

[Yue Daiyun (1979). "A Study of Mao Dun's Early Thought (1917-1926)."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01): 134-158.]

乐黛云 (1980a): “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03): 20–33。

[Yue Daiyun (1980a). “Nietzsche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03): 20–33.]

乐黛云 (1980b): “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04): 289–298。

[Yue Daiyun (1980b).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s in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and Improving Research on Modern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04): 289–298.]

乐黛云 (1989a): 《比较文学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

[Yue Daiyun (1989a).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乐黛云 (1989b): “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 《中国文化》 (01): 132–136。

[Yue Daiyun (1989b). “Chinese Modern Conservatism in the Dialogue of World Cultures.” *Chinese Culture* (01): 132–136.]

乐黛云 (1990): “展望九十年代——以特色和独创进入世界文化对话”, 《文艺争鸣》 (03): 14–17。

[Yue Daiyun (1990). “Looking Toward the 1990s: Entering World Cultural Dialogue with Distinctiveness and Originality.” *Literary Debate* (03): 14–17.]

乐黛云 (1991a): “文化更新的探索者——陈寅恪”,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04): 80–82。

[Yue Daiyun (1991a). “An Explorer of Cultural Renewal: Chen Yinke.”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04): 80–82.]

乐黛云 (1991b): “比较文学与文化转型时期”, 《群言》 (03): 30–32。

[Yue Daiyun (1991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Period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Qunyan* (03): 30–32.]

乐黛云 (1993): “‘昌明国粹, 融化新知’——汤用彤与《学衡》杂志”, 《社会科学》 (05): 58–62。

[Yue Daiyun (1993). “‘Illuminating National Essence and Integrating New Knowledge’: Tang Yongtong and the Journal *Critical Review*.” *Social Sciences* (05): 58–62.]

乐黛云 (1998): “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 《新东方》 (03): 49–57。

[Yue Daiyun (1998).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ew Orient* (03): 49–57.]

乐黛云 (1999): “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 《中国文化研究》 (01): 33–38。

[Yue Daiyun (1999). “Lu Xun’s ‘Po E Sheng Lun’ and Its Modernity.”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01): 33–38. DOI: <https://doi.org/10.15990/j.cnki.cn11-3306/g2.1999.01.009>]

乐黛云 (2004): “‘比较既周, 爱生自觉’: ‘取今复古, 别立新宗’——重读鲁迅在日本的四篇著作”, 《鲁迅研究月刊》 (08): 18–25。

[Yue Daiyun (2004). “‘Comparison Leads to Self-Awareness’; ‘Reclaiming the Past to Establish the New’: Rereading Four Works by Lu Xun Written in Japan.” *Lu Xun Studies Monthly* (08): 18–25.]

乐黛云（2011）：《清溪水慢慢流》。东方出版中心。

[Yue Daiyun (2011). *The Stream Flows Slowly*.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乐黛云（2015）：《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

[Yue Daiyun (2015).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ujian Education Press.]

乐黛云（2017）：《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

[Yue Daiyun (2017). *The Bridge of Cross-Cultural Dialogu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乐黛云（2021）：《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Yue Daiyun (2021). *Ninety Years of Vicissitudes: My Literary Journey*.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洪子诚（2008）：“有生命热度的学术——‘我的阅读史’之乐黛云”，《文艺争鸣》（10）：106–111。

[Hong Zicheng (2008). “Scholarship with Living Warmth: Yue Daiyun in ‘My Reading History’.” *Literary Debate* (10): 106–111.]

钱理群（2021）：“一个老学生的回忆与祝福——为乐黛云老师九十大寿而作”，《传记文学》（03）：37–42。

[Qian Liqun (2021). “Memories and Blessings from an Old Student: Written for Professor Yue Daiyun’s 90th Birthday.”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03): 37–42.]

王瑶（1954）：《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

[Wang Yao (1954). *A Draft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Literature Press.]

陈平原（2021）：《小说史学面面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Chen Pingyuan (2021).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Fictio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乐黛云（2022）：《层峦叠翠，深不见底——乐黛云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Yue Daiyun (2022). *Layered Peaks and Profound Depths: Selected Works of Yue Daiyu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